

# 作为一粒铺路石

我原本是学习绘画专业的。原先所学的院校，虽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艺术院校，但老师不错，有几位还是“右派”或有“历史问题”的，而且好歹也是“文革”前学了五年毕业。1978年春，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，我报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。中央美院先考，我被录取在师资班。都开学了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才发来准考证，美院这边意思是：“要考那，先退这。”想想，我也没有十成把握，那就算了。

1982年，经孙克兄推荐（这是最近才知道的），在万青芳兄的努力促成下，我被分配来中国画研究院（现中国国家画院前身），安排到《中国画研究》编辑部。隔了一天，张晨兄也被调了来一起工作。

## 关于《中国画研究》

《中国画研究》是中国画研究院由原先的中国画创作组改名后，于1981年春天筹备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学术丛刊。主编：蔡若虹，副主编：张安治、沈鹏。还有几个月才毕业的万青芳被提前要过来做具体编辑工作。当时是拣字手排铅印，工序繁多，慢而费事，通常出一本书用一两年都是快的。《中国画研究》能在短短的半年内成书，奇迹的背后是青芳的加班、辛苦。书成之后，在作为11月1日正式建院成立大会的礼品之一赠送来宾后不久，各地书店即传来售罄的消息，于是又作加印。我和张晨来后，主要是协助他编辑第三期和第四期，但他在第二期临开印时把我们的名字也加上了。青芳大度，我们却掠他之劳了。当时稿源充足，用不过来，还曾支援推荐给上海《朵云》一些。但好景不长，不久，院里发生变故，工作停顿，接着青芳兄赴美留学。1986年新院长上任后，我们曾多次提出恢复编辑出版，都不予答复。这里既有不重视学术研究，要“淡化学术”（一位副院长的私告）的原因，大约也不排除对我们的不信任。1986年6月，在陕西杨林召开的“‘中国画传统问题’学术研讨会”期间，我特别邀请卢辅圣、孙克等办刊同仁开了个座谈会，共议如何恢复办刊的问题，当时同行的刘勃舒、张晨和陈凤新都知道，事后，又特别写了纪要，上报院里，希望能促进一下，结果还是不予理会。1987年，经龙瑞推荐，张士增兄从《美术》杂志调来接编《中国画研究》，虽说是序号仍顺着原先的第四期，于1988年9月编出第五辑（此后都改称为辑），由原先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改为香港世界文库出版社出版，原来连载的邓白《中国画论初探》也被要过去接着做了连载，但开本由原先的大32开黑白胶版，变成了16开的



赵力忠近照

全彩印铜版，书封题名由原来的集字（据说是怀素的字），换成了吴作人题字。最主要变化是内容，由原先的以文为主的丛刊类，变为以当代人作品为主的画刊类，所以又加了副题，叫“画家与作品”。士增很有才华，文章写得好，有眼光，有思考，不会不懂研究的含义。如此大的改变，应是上有所示。1990年5月，李宝林兄由海军转业调来，担任业务处负责人，他极力主张恢复“研究”的出版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得到院里默许，于是他安排士增继续编“画刊”，由我来主持恢复“研究丛刊”，张晨则接手阮宗华去意大利后留下的刚出了两本三期的《中国画研究院通讯》。上面对研究古代没有兴趣，硬顶下去不好，那就减少古代的内容，后来干脆还是放弃了，但“研究”二字绝不能丢。1991年，我先是将近几年院里召开的几次学术研讨会，作为专辑汇集成第五辑，后来，就经过80年代美术新潮后余波尚存、中国画界一度处于不知所措左右彷徨的情况，我接连编出了“张彦远暨历代名画记研究专辑”、“李可染研究专辑”、“近现代中国画研究专辑”、“人物画创作研究专辑”、“傅抱石研究专辑”、“蒋兆和研究专辑”等。我的想法是：拾遗补缺，不与人挤。因为经费等原因，原先设想的每年编辑出版两到三辑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。

## 关于《中国画纪事》

1993年初，杨悦浦、孟庆江和邵剑武主持编辑《中国画年鉴》（1992年），王鲁湘分工做“大事记”，主要依据是当

年的一套《美术家通讯》。做完之后，鲁湘有点不放心，拿来要我看看。我细对之后，发现主要收录的是美协系统的内容，于是新增添了不少。张晨见了，认为这很符合院里说的要办成几个中心之一的“当代中国画信息中心”的要求，于是过去刊发在《中国画研究院通讯》上，署了我们俩的名字。按照原来的计划，“年鉴”要一年年做下去，邀我和鲁湘一起继续做“大事记”，但后来因为资金问题，1993年的“年鉴”不出了，可我们的“大事记”已经成稿并刊发在院“通讯”了。两年下来，外边反映还不错，于是宝林、张晨等鼓励我们就继续做下去。

既然是不再作为附录而单独成立，那就得好好想想了。首先觉得原称的“大事记”不大合适，于是自1994年起改为“纪事”；再是对当年的一些带有共性的苗头、现象和趋势等，仅从条目反映不出来，于是加写了当年的“热点与趋势”。所有这些，在文尾的“附记”已有所记，就不再重述了。

从1995年的《中国画纪事》开始，在一些条目的后面增加了些许点评性的文字，因是有感而发，故名曰“感言”。别看仅寥寥数语，多数不过百十字，却颇费推敲，有的还很不好写。比如，为写1月8日在京召开的“中日美术研讨会”的感言，特查阅了多份刊物及有关文字材料，并向多人核实现场情况，写出后又反复修改达十余次，直到三校后“核红”之前还在改动。点评中的有些词句往往斟酌再三，虽是由衷，仍不免有得罪人之处。为避免给院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特地在前加了个“编者附记”，强调“这只是他们的个人看法，既不代表本刊的意思，也不反映院里的意见”。

自1993年起，纪事部分我执笔的多一些，此为环境条件所致；点评部分的精彩之笔则多出于鲁湘之手，此系才情学识使然。

带有点评的“纪事”刊发后，业界反映不错。《江苏画刊》连续两年单独刊发了“感言”，上海的《朵云》则是分两期连续刊发了1997年纪事的全文、点评并增加了一些图片。事情虽然都过去了十多年，关于做《中国画纪事》这一段，这一件事至今仍有被同道们提起。2009年，学长薛永年兄在他手书自填词的《忆江南·赞力忠兄》中写道：“董狐笔，画苑记春秋，大事连篇别美恶，精言数语震名流，艺海驾方舟。”这其中的“记春秋，大事连篇”应指的是“纪事”或曰“大事记”，而“精言数语”即指其中的点评。至于词中所说的“董狐笔”、“震名流”等，那是客气是鼓励而已，万万不可当真。更重要的，这是鲁湘与我的共同之作，不敢掠美。

《中国画纪事》只做到1998年。1999年的草稿也做了，基本上快做完了，但是突然——有一天下班后，我将文稿整理好放入提包，准备回家晚上再做整理——途中，一个骑车的拎包贼从侧面蹿出，抓起我放在自行车车筐里的提包疾驰而去……他这一抢，把我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点点积累和编撰的心血变成了废纸，不知被抛向了何处！甚者，由此，也抢断了“纪事”的继续！

#### 关于院史

我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的前后，正是各地老画院恢复、

新画院纷纷创建之时，成为当代中国中国画创作的重要基地。要研究当今的中国画史，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院体制，应该是不可或缺的。联想到在美院写毕业论文时，令狐彪兄做宋代画院研究，几次说到资料缺少的苦恼。所以我到院后，便开始注意收集记录院里发生的一些事，包括捡拾了一些被扔掉的院里文字材料，甚至还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回来的一些东西。2001年11月底，为庆祝次年的建院20周年，院里要编辑出版画集，得知8月份我刚刚为中国美协的《1900—2000百年中国画集》做了《百年中国画纪略》（大事记），所以便让我也给院里做个20年的大事记。成稿之后，嫌长，嫌占了页码，便又做了个短点的。2002年2月画册出版后，我发现多处有误。3月，便又做了个第二稿刊发于“通讯”当年的第一期上。半年后，又根据反馈意见和新翻出的材料，在第四期上刊发了“反馈、补充与更正”。多年所收集的院史材料开始被一点一点翻出。

2003年初，中国美术馆筹备庆祝建馆40年，要开个大型学术研讨会，约我参加。经过此前的“纪事”（大事记）探路，我觉得二十年了，一代人的时间了，院史的早期部分可以动笔了，但这次是美术馆的活动，为了能贴上所要求的“社会转型与美术演进”这一主题，所以我便以“从中国画研究院的创建，看领导的关注对当代画院体制普遍推开的作用”为题，写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——中国画创作组将近四年中的辉煌与艰辛，被收入该研讨会的“论文集”中。会后，在原基础上又做了不少调整、修正和补充，以“遥想当年——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（1977·12·12—1981·11·1抽记稿）”为题，刊发于2004年“通讯”第一期上。这里所说的“抽记稿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未敢言全，即使我自己，说不定哪天又会从哪个纸袋里翻出被收起来的材料；二是有的材料有了，而且也写出来了，但发稿前还是被撤下来了，留待以后再说吧，免得自找麻烦。2009年，院里曾约我写建院30年的院史。准备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机会了，但我最终还是谢绝了。隔代修史，盖因当代人难为当代史，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（1954—2011）就是一例。华君武先生曾有一幅漫画名曰：《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小猫屁股也摸不得》。华老尚如此，我辈徒奈何。这正是：写大大麻烦，写小小麻烦，与其招麻烦，暂先别麻烦。

《遥想当年》刊出后不久，有一次见到学长刘龙庭兄，他说：“你的那《遥想当年》，我是一气读完的。你从哪儿搜集到这么多材料？”2001年岁杪，他“奉祈两政”送我藏头联一付，作我七十虚度之贺。联曰：“力蕴学问无虚处，忠贞人品有真魂。”其间的“学问”、“人品”愧不敢当。但若以“无虚处”来说《遥想当年》，尚勉心安。

我，才疏学浅，性又懒散，自知不是什么大料，但既进了这个行列，三十多年来，零零碎碎做了点鸡毛蒜皮的事，也未集结成册，只是为后人的研究积攒了点资料，铺铺路，勉为一粒小小的铺路石而已，静候历史车轮的碾压。

结语：做好自己（好者：尽心尽力）——不够，不与人比（比之：伤人伤己）——还行。□

赵力忠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